

廖沫沙是王实味第二

感谢文化大革命，揪出了三家村的三个酸秀才；感谢明报月刊重刊了邓拓和廖沫沙的几十篇成问题的文章，让我们读了觉得痛快。我说‘酸秀才’们，绝对不是对吴、邓和廖沫沙有所不敬，因为正统的毛泽东主义者，目他们为反革命黑帮，实则如果说他们造反，那也不过是秀才造反吧了，他们离裴多菲俱乐部还远得很呢。

廖沫沙的文章和邓拓不同，他很少借古喻今，蕴而不露，他的矛头直接对着官僚阶层，而且是指着领导者的，这是首长级人物，真正的国家统治者。在王实味的‘野百合花’以后，廖沫沙是最大胆的官僚主义的指斥者了。

在十四篇‘乱弹杂记’中，反官僚主义的文章占三篇：‘八股文领导’，‘官僚主义的“下限”’，‘被人民服务的人’。

他说：‘官僚不死，八股文不止！’

他说：‘凡是官僚主义，不论大小，都不是好东西，都应该批评、反对。……从严重性来说，小官僚主义不如大官僚主义，从时下的批评指责来说，又似乎大官僚主义不如小官僚主义。因为大官僚主义是逍遥于批评之外的。’

他说：‘这种人并不反对“为人民服务”，但是他们……把“为人民服务”看成了“被人民服务”或者看成了“人民为我服务”。所以他们威风不小……’

这样敢言的人，不为大官僚所喜是必然的。他不在一九五七年被当作右派份子公开的受打击，简直可以说是漏了网的幸运者。可是一九六一年又故态复萌，伙同吴晗邓拓组织三家村，非法无上，横议乱弹，宜乎视作眼中钉，非拔去不可了。

‘文化大革命’牵涉之广之深，并不能用‘官僚主义内部斗争’这们一言以蔽之。反对派的成员如何，他们有什么不同的政治意见，有什么纲领，我们并不知道，这种反对意见是否已凝结成人的分野，我们也毫无消息。这次被整肃的人，是非常庞杂的，军政教育艺术工商许多部门都被波及，有的本来臭名昭著；如周扬辈；有的是特务头子，早已使人闻名股栗，如罗瑞卿；有的本是廖沫沙所指摘的在批评以外的首长们，能代毛泽东发言的，如彭真；有的是著名的知识分子，如周予同；有的是心悦诚服的舞台艺术家，如周信芳……这个号称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，其指归在乎进一步确定毛泽东思想的一尊地位，实际上愈是用强制手段统一思想，愈把反对意见压抑下去，表面上的口号喊得愈热烈，对毛泽东的拥护也愈虚伪。矛盾的积累愈深，将来的爆炸力也愈大。

为什么毛泽东思想如此急于作为不容怀疑的统治思想？这不过为了维护整个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，这种利益不允许人有什么独立思想，因为独立思想最容易散布怀疑种子，怀疑应视为阶级的叛徒。如果在延安时代有人对‘衣分三色，食分五等’敢表不满，对‘歌啖玉堂春，舞回金莲步’的升平气象敢有所讽刺，那么这个人一定是‘混进党内来的托洛次基份子’（周扬死党已被整垮的林默涵的话，见明报月刊第四期三十二页）。廖沫沙的‘反革命黑帮’的罪名应与‘托派’同科，斯大林盛时的‘托派’，也都被控为反革命资产阶级复辟分子的。但我们由此不得不对廖沫沙表示敬意，相隔十五年之后（王实味的‘野百合花’发表于一九四二年），他本已参加了统治阶层，分得了官僚主义利益的一杯羹，他竟然步王实味的后尘，敢于对官僚主义加以直接的指斥与讽刺，以古喻今，他也可算得是一个现代的‘海瑞’了。